

## 读《论语》有感之八：法理人情

人的行为受人的意识的自觉能动性与社会制约性两方面的控制和指导。简单来说也就是人的行为来自两方面的约束——法律和道德。法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道德却是来自内心的软约束性。

一个国家要繁荣昌盛，要国泰民安，就要从两方面着手，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法律和道德。真正文明的社会最终是依靠民众高尚的道德情操来维护的，但人追求幸福的动力远远少于避免痛苦的动力，初始阶段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大家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而又可行的。

任何文明、任何政权都不是简单靠文治能够获得的，往往都是要靠武力作为前奏才可以获得。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更迭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新加坡是全世界公认的最文明的国家之一，同样新加坡也是典型的法制国家。全国只有 400 万人口，有 1 万多名警察，9 个警署和近百个派出所，近万个居民委员会，实行警民联防。全国还设有 200 多个预防犯罪委员会。

在新加坡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普遍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遵纪守法的习惯。新加坡非常重视立法工作，建立有严格的立法程序。法律草案首先由政府部门提出，经内阁讨论决定后，提交国会审议。新加坡是一个法制完备的国家。法律、法规、条例多达 400 多种。大到政治体制、经济管理、商业往来、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小到停车规则、公共卫生、货币管理，都有相应而详细的法律规定。如法律规定只要拥有 15 克海洛因或 30 克吗啡，一经查获，即视为贩毒，判处绞刑；作案时开枪的案犯一律判处绞刑；非法持有枪支者，判处监禁 5 到 10 年，或至少处以 6 下鞭刑。新加坡卫生规章规定，发现谁家有蚊子，第一次即可罚款 50 新元（1 新元等于 5 元人民币左右），最高罚款达 1000 新元或处三个月徒刑。如乱丢垃圾，罚款 1000 新元；随地吐痰，最高罚款 1000 新元；酒后开车罚款 10000 新元，并监禁 1 年。新加坡至今仍保留英国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鞭刑。对那些受人们痛恨但又罪不当死的偷盗、抢劫、强奸犯施以鞭刑。鞭子用专门的藤条制成。行刑前用水浸泡，行刑时经特殊训练的行刑人员用力抽打犯人臀部。重鞭两下，皮开肉绽，一个月痊愈后，再打两鞭，以此类推。从严处罚，使更多的人，不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据受过此刑的人说，宁可罚款、坐牢，也不愿受鞭刑。而执行官则说，这么多年了，打的都是新屁股。这说明，鞭刑还是极具警戒作用的。在新加坡，任何人犯法，都必须接受惩罚，外国人也不例外。一些国家对新加坡的鞭刑有种种非议，而新加坡则我行我素。受鞭刑者中最出名的莫过于美国青年费伊。1994 年费伊到新加坡游玩，触犯了涂鸦和行为不轨的法条，被判入狱及鞭刑六鞭。一时间，舆论哗然，费伊的家属呼吁，美国政府抗议，克林顿总统也表示了关注，还有些国家首脑更是帮着“说情”，而新加坡方面却认为，任何国家的公民在新加坡，都必须遵守新加坡法律。结果，新加坡司法当局力排众议，对费伊不客气地执行了鞭刑，这在当时，可算颇具轰动效应的一大新闻。

因此新加坡被人们一语双关地称为“A Fine place”意思是“一个美好之地”，又是“一个罚款之地”。正因为新加坡这种对待犯罪的强硬立场和态度，使新加坡的社会治安闻名于世，成为犯罪率最低的国家。有人说的好：文明不会从天而降，要靠法治，法治的后面就是文明，有了法治，文明就不会太远了。

德国也是一个闻名于世的法制国家，前几天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德国人有一次在中国大街上，他盯住一个送活鸭的私人小三轮看了半天，最后颇有些忧郁地告诉身边的人说：“这在德国是要坐牢的。”看见边上的人一头雾水的样子，他解释说：“笼子中鸭子太多，没有适当的活动空间，此外也没有饮水供应，还有用这样的交通工具运鸭子，容易造成意外死亡。”和他一起同行的中国人都不可置信地呆看着他，以为这是一个拙劣的笑话，可他抗议道：“我是认真的。”

在德国有这样的法律：禁止“活杀”一切肉用牲畜，任何屠宰都要首先打麻醉药，等其意识丧失后才可以下刀，以确保牲畜们平静祥和地走上天堂之路。同时法律还保护动物有合理的生存空间权。想养狗？得报告自家居住面积和划分给狗儿的活动面积，不够标准的免谈。想养马？那你得先攒钱买个草场。想养两条狗？得看它们是否合得来，不然小心邻居看到你的其中一只小狗在角落中哀鸣后，会愤然向警局报警。

我想，这样一部法律对大部分中国人恐怕更接近一纸荒唐言，毕竟我们在连人的生存空间都无法保障的情形下，哪里会去奢谈什么动物的权利？事实上，即使在欧盟，这也是个被大肆嘲笑的法律，不过德国人不管那么多，他就认这个死理。

我前几年去过德国，同行的导游就和我说了很多德国法制的一些事例。比如，如果你闯红灯，第二天保险公司就会登门造访，要求更改保单，理由是闯红灯的人出事的概率要比常人高，自然保费也要高出许多；紧接着合作银行也会自动上门来，降低对你的信用卡授信额度，理由是闯红灯的人也是不守信的人，透支消费自然要受到限制。又比如，磁悬浮高速列车是德国人发明的，但到今天为止德国还没有一条磁悬浮列车，为什么呢？因为土地是私有的，要建造一条磁悬浮列车轨道要征用大量土地，民众不同意也就没有办法了！

瑞士是一个小国，但在国际上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瑞士钟表全球第一，瑞士同时还是欧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也是闻名于世的会议之都，瑞士的人均收入全球排名第三（第一是卢森堡，第二是挪威）。但难以想象的是瑞士的首都伯尔尼却至今还没有机场。为什么没有机场？据说每一次伯尔尼民众投票的时候都没有通过所以政府也不得不无奈的放弃一次又一次打算建造机场的想法。让人不解的是这样发达国家的民众选择不要机场的理由是嫌飞机升降的时候噪音太大，嫌全世界太多人到来会打破他们的宁静。

相比较新加坡、德国和瑞士这些国家而言，在法制上我们的国家就相差太远了。

海口某高速路段，一辆正常行驶的别克凯悦为了紧急避让一个突然横穿封闭高速道路的妇女，撞上了护栏，车辆损毁严重，该违章妇女见状迅速翻越护栏逃离现场，置车内受伤人员于不顾，由于当时车内人员不同程度严重受伤，已无力拨打报警求救电话，虽然后来有过往车辆报警，但因耽误时间，司机及三名

车内乘客两死两伤，这一幕被该路段监视录像拍下！虽找到该名肇事妇女，因为《新交通法》的规定行人不可能作出赔偿，死伤者家属以此向法院提起诉讼无效。

生活中我们遇到的不合理的事情比比皆是。比如：偷自行车的小偷，公安抓住了，政府还要用纳税人（包括被偷人）的钱买饭给小偷吃，然后再放他出来，放出后他还是去偷，不被抓就发小财，被抓了又能吃公家饭，还可以在里和同行切磋手艺，过不了一两天，又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按中国法律，小偷不算犯罪，按现在的立案标准，小偷就是偷十把二十辆自行车也达不到立案价值，而中国的法律又没有对小偷进行有效惩处的法律条文，于是，下岗职工每月被偷二、三辆用于谋生的自行车是很平常的事了！再如在名胜乱写乱画、在日常不讲卫生，随地吐痰乱丢垃圾、不讲公德造假害人、不守交规乱撞机车道等等，中国法律都没能有效惩处这些犯事的人。

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违法乱纪的份子？就是因为惩处力度不够导致成的！设想一下，如果偷一辆自行车就要像在新加坡一样予以鞭刑还会有人偷自驾车吗？不要说这样皮开肉绽的鞭刑，即便是罚款两三万元一次，我看以后自行车即使没有上锁停在马路中间都没有人要了！同样，为什么中国的贪官污吏总是层出不穷？是因为贪官污吏被惩处的概率太低了，而惩处的力度又低得很，自然会有很多人铤而走险了！如果一个赌庄能够维持公正，一定会门庭若市了，也就是说只要确保每一个人的赢的概率有 50%，那么参与的人都会趋之若鹜。做生意的真正能够最后成功的人非常少，很多人拼死拼活地做事，最终也往往是混口饭吃而已。而当官的贪污被绳之以法的比例有多少呢？1/10 还是 1/100？而贪污被惩处死刑的又是 1/10，还是 1/100 呢？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不顾一切贪赃枉法的原因了！

这种种的现象中国人是见怪不怪了。我们对国家的治理只能是提提意见，或者感慨一番，但涉及到企业管理就完全可以在明白事理以后采取更加有效的办法了。

几年前跟随浙江省经营管理协会的人员走访了许多企业，其中走访的茉织华服装公司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茉织华公司是国内最大的服装加工企业，公司内有四星级的宾馆，办公大楼是按照白宫的样子进行建造的，极尽奢华。接待我们的是茉织华公司的藤副总，在给我们做了声情并茂的一个多小时的介绍之后让我们提问题，我是第一个被点名提问题的人，当时我是这样说的：“藤总，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热情接待，非常佩服茉织华人的认真执着的精神，非常佩服茉织华人注重承诺，一切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我非常认真的看了贵公司的文化手册，上面写道，茉织华的管理就体现在一个‘严’字上。我看了一下手表，在你讲话的 81 分钟的同时，贵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和您另外的员工也在边上窃窃私语了不下一个小时，虽期间有人提醒希望她们不要窃窃私语，但她们不予理会。对于一个接待部门，她们这样的表现即损害了企业的形象也影响了别人听您讲话的效果。不知您对这样的违纪现象是怎么处理的？还有再想问一下她们这样的行为是对您表示不尊重还是对我们表示不尊重呢？”藤副总听完我的话显得很尴尬，无奈地说：“也许她们有要事要商量吧！”为了不让藤总难为情，我没有继续追问，但说着真的我对这个企业原来的好印

象突然之间荡然无存了……

企业的制度要不就不要定了，定了就是企业的法律，任何人都不得违抗，否则都要接受处罚！但问题是现在的众多企业既不能落实制度，并且真的违法了制度也是点到为是，象征性的处罚一下就草草了事。这也是很多企业的员工总是不断犯错的根源了。

举个例子，就说迟到吧。大多数企业对迟到现象一般也就是处罚一个5元或者10元就了不得了。实在是迟到的成本太低了，所以迟到的现象在众多企业总是屡屡发生。如果是处罚200元一次或者500元一次设想一下还会有人愿意迟到吗？

双枪的良好企业文化一直深受外界认同，尤其是双枪员工的高素质更是被外界所称道，其实鲜为人知的是双枪早期的制度也是非常严厉的。比如会议培训期间迟到、交头接耳、进进出出，平时吐痰、乱扔东西等违反纪律的都是处罚500元/次，其中吸烟被发现还处罚1000元/次。如果是严重违法企业文化的，比如偷考和虚报费用等行为都是要被解聘或者接受5000元的处罚的！而如果员工当年累计在企业有三次被处罚的经历，公司将无条件对这样的员工予以辞退！

有些人总以为过于严格的制度是不够人性的表现，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高速公路上的护栏，是约束了大家的行车自由，还是保护着车辆更加安全和快速的行驶？如果谁在开车的时候没有到出口处想出去，会有人傻到要用车子去撞护栏吗？不会！真有这样的傻子敢冒险，付出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并且可以保证下次绝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严格的制度也是这个道理，表面上看起来很不人性，甚至可以说很不人道。但其结果是根本就很少人会受到处罚，因为代价太大了！

当然治理国家光有法律，管理企业光有制度都不是足够的。治理国家最终靠的是民众的悦服而不是吓服，管理企业也是一样，最终靠的不是制度，而是文化！

《论语》中有这么一段话——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大意是——孔子说：“如果以法制教化百姓，百姓不从则以刑罚强化他们服从，以达到整齐如一的效果的话，那么百姓自然可以钻法律的空子来苟且偷生，却绝无羞惭愧疚之心。如果以仁义之德教化百姓的话，以礼法约束百姓的言行，那便会使明白遵守礼法乃是正道，违反礼法乃是一种耻辱，由此便有了羞耻之心，从而能够加强自律，不违反礼法。”

孔子说，治理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以法律为准则，一旦老百姓不听话，就用严峻的刑罚来制裁他们，那么老百姓虽然一时被镇压下去，但是并不心服口服，因此内心也就没有羞耻感，不会主动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老百姓还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去钻法律空子以逃避法律的制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此一来，实在是防不胜防。因此说单纯依靠法制，从外在来强制老百姓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真正做到收服老百姓的心。

战国时齐宣王想要趁燕国内乱入侵燕国，他向孟子征求意见。孟子说如果燕国老百姓受苦已久，欢迎

齐王来解救他们的话，那么采取行动就没有问题；反之，即使以武力占领了燕国，由于得不到民心，也不会待得长久。齐宣王没有听从孟子的意见，还是以武力侵占了燕国。结果惹怒了各诸侯国联合起兵，在燕国百姓的帮助下，打败了齐军，齐宣王落得一个名利双失。

汉朝的陆贾曾经对刘邦说过这样的话：马上得天下，但是不能再去马上治天下。陆贾的目的是提醒刘邦在治理天下时要注重文治，而不要像打天下时那样看中武力的强制作用。刘邦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其实刘邦是有历史之鉴的。秦王朝靠武力统一了中国后，它的政策思想没有及时调整过来，仍然是法家强制霸道的那一套，乃至不近人情。最后终于逼得天下人揭竿而起，毕力攻之。秦王朝也就成了历史上有数的几个短命王朝。

历史上如果说到攻心术用得最好的例子莫过诸葛亮七擒孟获了。七擒七纵，只为让对手心服口服，保得一方的永久太平。这是诸葛亮心胸气魄，远见卓识体现的最好一个例子了。

我们永远不要指望法律能够包容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并从根本上杜绝犯罪。法律可以制裁犯罪，但却无法杜绝犯罪。这是法律自身无法克服的死穴。

上面我们所提到的新加坡政府，除了制定严厉的法律，同时也是十分重视基础教育，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新加坡的学校从建筑到设施都堪称一流，同时也非常注意师资的培养和质量，并给予了教师非常高的待遇。新加坡人受教育水平是很高的。在教育内容上，他们十分注重从小进行法律意识培养，并把这种教育融于多种形式之中，如传播媒介，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报纸杂志，几乎见不到不健康宣传内容。比如在母亲节即将来临，打开电视、展开报纸，都会告诉你，母亲节到了，给母亲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千万不要忘记母亲的慈爱恩情。没有不切实际的高调，实实在在，充满爱心。很显然，这样一种良好的氛围，对于提高人的素质，纯净人的心灵，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预防违法犯罪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经过多少年的努力，自觉遵纪守法，在新加坡已经蔚然成风，可以说严厉处罚的阶段已经过去，换来的是安宁的社会秩序。而那一项项严格的管理法令也仅仅成了一道道令人警醒，不得逾越的界线。

也就是说治理国家既要从制定和落实严厉的法律方面着手，也要从塑造大家高尚的道德情操着手。所谓的道德就是指人类社会生活中所特有的，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的，并以善恶进行评价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道德贯串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社会公德、婚姻家庭道德、职业道德等。它通过确立一定的善恶标准和行为准则，来约束人们的相互关系和个人行为，调节社会关系，并与法一起对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起保障作用。道德是对人的社会性的自我约束和心理约束意识。对道德的维护，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社会性的维护。需要从宗教、教育的作用多方面来实现。

中国人缺失严密而严厉法律的约束，更缺失高尚的道德的约束。中国人接受教育少，而教育中又存在很大的问题。西方国家道德很大体现在宗教信仰上。西方人有宗教信仰的比例高达 90% 以上，而我们中国

人有宗教信仰的人非常之少，大概在 30%，并且有宗教信仰的人大多属于少数民族和农村人口。决定社会主流的发达城市人群几乎上没有宗教信仰。

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是感恩性的，在祷告时候要不就是感谢天主，要不就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而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大多是现实性和功利性的，跪拜的时候念念有词的往往是“菩萨保佑，保佑我平安（早生贵子、发财、去病）”，一旦菩萨没有显灵，马上就可以痛骂菩萨偏心。还有西方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都只是信仰一个主神，也就是上帝。而中国的宗教信仰从来没有出现过统一的和单一的神，今天拜玉皇大帝，明天拜观世音菩萨、后天拜土地神、关公……总之，要什么就拜什么。

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和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都无法解决人会死去这样一种恐惧的心理（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认为人死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留下，和任何生物死去没有任何差别；有宗教信仰的人认为人死后要过奈何桥，要喝王婆汤，要变成鬼在阴冷的阴间游荡）；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认为没有上帝，认为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都不会得到报应；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认为即使做尽坏事只要去烧香拜菩萨，只要花点钱在寺庙里就保得一生平安，因此不管是有宗教信仰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都自然会不择手段去争取得到自己所需要得到的东西，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有三大危机：环境和资源危机、政府官员普遍腐败危机和民众信用危机。信用危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最缺乏信仰，一个缺乏信仰的人自然可以胡作非为，而不用担心会受到惩罚也不会内心不安。

要建设文明的国家一开始的时候需要通过严厉的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比如随地吐痰罚以重金。但到了后来，如果通过教育，让民众了解随地吐痰是一种非常不健康和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并自发的不去随地吐痰，对随地吐痰的人还表现出厌恶和批评的时候，就表现出文化对民众行为的约束了。这样的变化就是社会进步一个标志。企业管理也是这样的道理。比如迟到，一开始需要用高额的罚金来规避员工不迟到，到后来如果让员工形成迟到就是一种不守信，就是人格上有问题的思想，自发不迟到和不能容忍别人迟到并予以指出的时候，文化的力量就表现出来了。员工的行为从明文规定不能做和怎么做，到文明指导不能做和怎么做的时候，企业的管理才算是真正上了一个台阶了。如果一个企业员工对企业的所坚持的东西当成一种信仰神圣不可侵犯，移植在员工心中的企业文化会让一个企业无坚不摧！

双枪文化所倡导的和社会所倡导的是一致的，比如热爱大自然、呵护大自然，呼唤和渴望人与人之间真诚以待，追求与社会共荣，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等等都是极具感召力的。在文化具有先进性和优秀性的同时，双枪更是不遗余力的在培育着自己的员工。新员工有一个月的入职培训，双枪的职员以及管理者每周都要接受三个小时左右的培训，每周还要至少阅读一篇由总经理室提供的推荐文章……正是双枪有着严格的制度和完善的企业文化，我们才相信双枪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屹立于行业的巅峰，并不断往越来越健康的方向发展。

从国家的角度上看，治理国家要从法律和道德两方面着手；从企业的角度上看，管理企业要从制度和

文化两方面着手；从个人的角度是上看，既要遵纪守法，也要有着高尚道德情操。

经营企业的道理不复杂，而人活着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但如果能够参悟得透，就可以尽量少走弯路和早日收获成功。一艘轮船在海上行驶中遇到暴风雨即将沉没，船上的旅客们争先恐后地逃生。而一位哲学家这时发现船上装载的一头猪在窝里悠闲自在，满不在乎，浑然不觉。于是哲学家深有感触地说：“这才是真正的智者啊。”明知道无法生存就不再慌乱消耗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和知道如何更好的生存而去坚持什么一样的困难。滚滚红尘中的你是否懂得坚持什么和放弃什么了吗？！